



通向大国之路的
中国策

大国策

为中国策

为国是谋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大战略

主 编 高全喜
执行主编 谈火生 袁贺

人民日报出版社

大國之道 在明明德 在親民
強國之鑒 在止于至善



通向大国之路的
中国策

大国策

为中国策

为国是谋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大战略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国策：通向大国之路的中国策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大战略/高全喜主编．—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6

ISBN 978-7-80208-915-0

I. 大… II. 高… III. ①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中国②发展战略-中国-文集
IV. D616 D6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08706 号

书 名：大国策：通向大国之路的中国策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大战略

出 版 人：董 伟

主 编：高全喜

责任编辑：季利清

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100733

发行热线：(010) 65369527

邮购热线：(010) 65369530

编辑热线：(010) 65369514

网 址：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

开 本：16

字 数：287 千字

印 张：18.75

印 次：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08-915-0

定 价：49.80 元

法治成就大国

——《大国策》系列丛书导言

高全喜

《大国策》丛书，旨在为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读者提供一份思想的盛宴，为治国理政者提供一份决策参考。丛书共四十多册，荟萃学者五六百人，其主题集中于大国之路和强国之鉴。我曾经主编《大国》学术丛刊，对于现代国家的法政建设有自己办刊的思考，今受嘱谈点感想，权且作为导言。

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大国，这没有什么可争议的，上下五千年，纵横八千里，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我们的自然禀赋、人口规模、社会结构，乃至意识形态、人文风情，等等，都注定了我国是一个大国。但是，大国不等于强国，更不等于优良的法治之国。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如何从内政上厘清一个大国与强国之间的本质性不同，在外交上构建一种国与国之间的责任关系，需要我们有一双“法眼”。

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不同于古代，古代王朝政治的国家治理经验，例如被某些学者所褒扬的“德治”、“峻法”，以及“朝贡体系”，等等，在当今世界，已经失去了原初的功能和效用，现代社会迫使我们建设一个新型的国家，即法治国。一个社会犹如一个活的生命体，法治是其中的骨骼和精髓，其他的所谓国之“大”者，不过是一堆肉泥而已。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法治，尤其是正义的法律之治，它的国土再大，人口再多，资源再丰，历史有多辉煌，文化有多灿烂，人民有多勤劳，这一切的一切，不

过是人家或列强口中的尤物。

中国的近现代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部寻求法治国的挫折史。我们知道,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这个老大的帝国逐步崩溃了,但如何重新建设一个共和国,却是歧路复歧路。我们有康梁变法、孙中山革命、“五四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对于“德先生”、“赛先生”的呼吁,有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梦想,直到今天,我们才意识到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我认为,强国梦的关键在于法治,只有法治国才能成就一个真正的大国,一个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的强国。

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必须有凝聚力,有支撑一个国家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从人类历史的经验来看,凡是真正的持续强大的国家,而不是消耗型的短暂的所谓一时之强国,必定是一个法治国,法治不但可以维护和保障一个社会秩序的稳定,树立国家的权威,而且可以使人民自由和幸福。法治与自由并不矛盾,恰恰相反,只有法律才能防范他人或政府的恣意侵犯,为人民自由地从事经济活动提供规则与秩序。法治是一个国家经济繁荣的基础,凡是法治优良的国家,人民追求财富的合法欲望不会受到压抑,私人财产受到严格保护,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在有效法律的调节之下健康而有序地发育和成长,经济和贸易必定繁荣兴旺,充满活力。

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一个政治上专制的国家,但只要它的法律制度是独立的、公正的和有权威的,也仍然可能成为一个强国,例如英国和法国的有限君主专制时期就是如此。当然,如果能够继承自己的政治文化传统,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共和的法治国家,那么,一个自然禀赋上具备了大国条件的国家,就必定是一个强国,而且是一个自由的强国,人民在这样的国家里充分享受了作为大国国民的自由、福祉和荣耀。因此,他们发自内心地把这个国家视为自己的祖国,可以奋不顾身地为自己的祖国牺牲,这就是哈贝马斯等人所说的“宪法爱国主义”,或公民爱国主义。其实,这种爱国主义可

以追溯到古代罗马共和国,正像西塞罗所指出的,罗马人民对于国家的热爱,与其说是对于它的国土,不如说是对于它的法律,对于共和国的政体制度。这种宪法爱国主义与近代日耳曼国家的基于民族精神的爱国主义是大不相同的。

今天在中国的语境下重新思考建设自己的强大的国家,我认为,法治国以及与此相关的法律意义上的爱国主义更具有本质性的积极意义。在近二百年的中国近代历史中,我们的国家建设屡屡受挫,虽然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法治不彰显然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因。要说,我们不乏奋斗的勇气、革命的精神和爱国的激情,也不缺乏建国方略、五年纲要和十年规划之类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方针政策,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少有法治主义的保守和审慎精神,少有法治国的恒久的建设目标。

因此,建设一个法治国便成为首要的国家主题。法治昌明,政体稳定,人民才有追求财富的欲望和恒心,国家的税收才源源不断,公民美德才得以光大。对此,休谟曾经有精辟的论述,他说:“在所有杰出的留有难忘成就的人物中,首要荣誉看来应属于立法者和国家缔造者,因为他们为保障后代的安宁、幸福和自由,留下了法律制度和政治体制。”

在当今国际社会,人们经常谈到大国责任,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是大国或超级大国对于今日世界的基本承诺。随着中国的崛起,把中国视为理所当然的大国,并要求其承担必要的大国责任,这似乎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一致吁求。

我们看到,无论是从内政还是从外交来说,国家责任都是我国目前面临的一个中心课题,而这一切又都必须依靠法治,法治国是实现国家责任的基础。在国内政治领域,作为国家的治理者和领导者,它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有责任保障人民的权利不受侵犯,有义务维护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平与安宁,有责任和义务惩治腐败,建立廉洁、高效的法治政府。在对外关系方面,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关于中国威

胁的论调甚嚣尘上,对此,我们虽然提出了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的方略,但国际社会的担心并没有太大的改观。这是为什么呢?在我看来,关键是法治还没有落实到位,也就是说,由于怀疑我们还不是一个法治国,所以对于我们的承诺,国际社会还大多视为政治上的修辞。

其实,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对于我们不仅具有内政的意义,而且还具有深远的国际意义。在当今世界,所谓大国责任,最基本的是意味着法律上的责任,即一个国家在法律制度上要承担的国际责任。它首先要求的是一个法治政府的存在,一个遵循法治的国家,才可能是负责任的,否则无论如何表白,都具有权宜之计的性质。因此,和平发展也好,和平崛起也罢,关键在于要切实地建设一个法治国家。就近代世界历史来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两个民主法治的国家开战的事件,所以,所谓民主和平论就成为了当今和平论的一个主流理论。无论从近期的国家事务还是长远的民族未来来看,世界和平对于中国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因此,我们有理由把法治国的建设置入国际环境的大背景来考虑。

当然,中国在国际事务做负责任的大国,并不意味着要与美国一致,也不意味着非要与美国对抗。关键在于要做一个具有独立主体意识的国家,而这个国家意识不是某个人或某个集团的一己之私,而是国家利益,是法治下的国家人格,体现的是人民的意志。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认为我们要警惕两种极端的态度,一种是民粹主义的极端情绪,另一种是极端的亲美主义。在我看来,这两种态度都是盲目的、幼稚和非理性的。政治是一种审慎的技艺,需要政治上的实践理性和一个民族的政治成熟。

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我国坚定不移地走法治国家的建设道路,我们就有可能建立国家的自主性,从贫弱的大国走向富强的大国,走向对内对外都负责任的自由的大国。

目录

CONTENTS

法治成就大国

——《大国策》系列丛书导言	高全喜 / 001
---------------------	-----------

战略是纲,纲举才目张

美国把“国际战略”称为“大战略”。冷战时期,美国的大战略是“遏制战略”,以苏联为主要敌手;克林顿时期,美国搞“接触与扩展战略”,经济、安全、人权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三大支柱;“9·11”之后,美国实施“反恐战略”,以伊斯兰激进势力为主要敌手。美国历来重视战略,而且释放出来的全球战略意图非常清晰。一个国家不能没有战略,缺乏战略主线的国家,谈不上大国,更谈不上崛起。

中国大战略	蔡 拓 / 002
关于构筑中国国际战略的几点看法	王缉思 / 011
大国崛起与国际秩序	门洪华 / 021
美国权势、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	时殷弘 / 032
“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和平崛起	陈 岳 / 040
“中国责任论”考验和平发展	刘建飞 / 050
国家主义、地区主义与全球主义	门洪华 / 058

“中国模式”能不能成为世界模式?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搞了一个智库,叫“欧洲研究中心”。这个智库认定:世界上只有两个模式,一个是美国模式,另一个是欧洲模式。从长远看,欧洲模式比美国模式更具吸引力,因为美国主张单边主义,而欧洲主张多边主义。2005年之后,这个智库否定了当初的结论,认为世界上还存在一个“中国模式”,对于非西方国家而言,中国这个模式的吸引力可能要远大于美国模式和欧洲模式。

- 从千年史看百年史 萧功秦 / 072
- 探索中的“中国模式” 蔡 拓 / 100
- 理解“中国模式”的制度视角 田春生 / 106
- 解读中国发展之谜 景天魁 / 113

“威胁论”是大国崛起的前兆?

面对中国崛起,西方的心态很复杂。一会儿“中国崩溃论”,一会儿“中国威胁论”,然而,西方的许多预言一一在“中国奇迹”面前破产。中国的韬光养晦策略收到了效果,一边向西方学习,一边坚持中国特色,短短 30 年时间内,把位置挪到了世界的前面。在同一跑道上被别人超过,西方觉得很不开心,于是“杂音”不断。中国没有必要反驳对方,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用事实证明中国不会崩溃,也不会威胁谁。

- 中国改革路线之变 郑永年 / 126
- 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 王永钦 张晏 章元 陈钊 陆铭 / 133
- 改革战略与中国奇迹 徐湘林 李国强 / 148
- 中国改革模式新解:鸟笼结构的嫁接式改革模式
..... 杨运杰 张孝德 / 162

全球化:学会跟“恶邻”打交道

自从欧洲殖民者敲开全球化大门之后,一体化浪潮变得势不可挡。不管强国还是弱国,不管大国还是小国,都是“地球村”里的“邻居”。中国有“择邻而居”的习惯,但全球一体化,特别是加入WTO之后,中国没有权力选择自己的邻居,必须学会跟“恶邻”打交道。值得期待的是,中国作为“地球村”的重要成员,可以充当“村长”,也可以选举“村长”,维护“地球村”的和谐和秩序。

- 全球化与中国的国家建构 郁建兴 肖扬东 / 171
- 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与实践 蔡 拓 / 185
- 全球化与中国发展道路 张二震 / 204
- 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新角色 郁建兴 徐越倩 / 213

世界单极与世界多极

前苏联坍塌之后,全世界本可以由“两极”变为“多极”,但后来的事实恰恰相反,这个世界最终跑到了“单极”轨道上。无论是美、欧、中三角关系,还是美、中、俄三角关系,美国总是唯一的主角,其他国家充其量是一名小股东,在全球“董事会”里,仍然是美国说了算。单极是危险的,也不会持久,世界格局“非极化”成为全球力量制衡的重要方向。

- 机遇与挑战:单极世界与中国的和平发展 贾庆国 / 228
- 世界格局中的“非极化”趋势 刘建飞 / 243
- 国际体系转型与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 黄仁伟 / 251
- 国际法律秩序与中国的和平发展 饶戈平 / 266
- 亚洲地区秩序的转变与中国 庞中英 / 277

战略是纲，纲举才目张

美国把“国际战略”称为“大战略”。冷战时期，美国的大战略是“遏制战略”，以苏联为主要敌手；克林顿时期，美国搞“接触与扩展战略”，经济、安全、人权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三大支柱；“9·11”之后，美国实施“反恐战略”，以伊斯兰激进势力为主要敌手。美国历来重视战略，而且释放出来的全球战略意图非常清晰。一个国家不能没有战略，缺乏战略主线的国家，谈不上大国，更谈不上崛起。

中国大战略

蔡 拓

中国大战略研究何以受到关注

众所周知,对于战略的关注与研究并非始于今日,但明确倡导中国大战略的系统研究则是近之事。基于此,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值得重视:

首先是中国和平崛起的需要。中国正在崛起,这个基本事实毋庸置疑。尽管国际上有些人对此不喜欢、不承认,甚至以“中国威胁论”加以诋毁;尽管中国人自己为了避免刺激当下国际社会中的主导性大国,希望为自身赢得更和平的国际环境,而把崛起解释为发展,甚至不提倡“崛起”这个词,但崛起毕竟是事实。当世界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中国崛起时,中国人自身对崛起的目标、进程、方式、后果是否有清醒的认识和理性的思考呢?恐怕真的存在问题,至少是缺乏严密的战略上的审视与设计,而这恰恰是大战略研究所擅长的。换言之,通过大战略的研究,对中国崛起进程中已经出现或可能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全面评估,并为消除国际社会的疑虑,真正实现和平的崛起和持续的发展提供理论咨询是十分必要的。

其次是对中国模式之讨论的回应与深化。关于“中国模式”、“中国发展道路”的讨论近几年颇为活跃,特别是2004年5月7日,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在伦敦《金融时报》上提出“北京共识”后,这方面的谈论更为热烈。“北京共识”概括了中国发展的三个定理:其一,强调创新的价值,即在技术上不能沿袭陈旧技术和发展老路;其二,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平等性;其三,自主理论。这三个定理并无太多新意,文章之所以

备受关注,并掀起“中国模式”讨论热,是因为文章的核心在于探讨中国发展模式的国际影响,以及如何与中国打交道、如何对待崛起的中国。来自国际社会对“中国模式”的探讨表明,“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等别有用心的叫嚣或非理性的偏见,无法压制世人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的敬佩与赞叹。当人们以更理性的目光审视当代中国时,中国何以能迅速发展,其发展有何值得借鉴的经验,世界会因中国的发展产生哪些变化,如何应对这种变化等等问题就自然会产生。这时候,也只有这时候,中国的重要地位与影响才会真正凸现出来。中国的确成为世界的中国,它的发展战略与模式已引起世界性的关注。

国际社会的“中国模式”讨论热,也促使中国人自己反思:我们对改革开放以来自身的成绩、经验、问题、影响及其发展前景的理论总结与提升到底够不够,我们是否有清醒、明确、严密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国家战略?毫无疑问,在这些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从宏观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就是对中国发展模式与道路的总结。而建立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确定以及制度化的五年发展规划,也的确是国家战略的反映。但是,这些还不足以替代一个完整的中国大战略。因为一个富有学理性的大战略,需要有严密的理论框架和有说服力的论证,要体现内在的理论逻辑和有指导性的路径与方案。正是鉴于此,中国学术界很快加入到国际社会的“中国模式”大讨论中,以便在这一过程中更好地认识自身、总结自身、指导自身。显而易见,由“中国模式”讨论热引发的理论思索,同样把中国大战略研究推上前台。

大战略的界定与中国大战略的定位

大战略是个颇有歧义的概念。从国际学术界来看,对大战略的理解最有代表性的见解是以下三种:

首先,大战略是对战争的谋略。这是最传统、最经典的理解。这种理解使大战略仍然紧紧围绕着战争,但需要指出的是,战争并不仅仅意味着军事手段,赢得战争要靠各种手段的综合利用和国家全部资源的有效调动。此外,战争的目标、目的更受到重视,而战争的手段则居于从属地位。正是基于此,我们看到,《大英百科全书》(1967年版)将大战略定义为“为了达到战争(与和平)的目的而动员一国或几个国家联合起来的所有资源的艺术”。而利德尔·

哈特则认为,“大战略的任务是协调和指导国家的全部力量以便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即国家政策所确定的目标”。美国学者罗伯特·阿特在其新作中强调,“大战略告诉人们,一个国家应当怎么样通过运用军事力量来实现外交政策目标”。他仍然重视军事手段运用,但着眼点却是国家的外交政策目标。由此不难发现,大战略是通过战争或在战争中实现政治与外交目的的艺术。

其次,大战略是国家安全战略。这种见解强调,国家运用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等各种手段实现的目标不仅是赢得战争胜利,还应当包括国家安全。约翰·柯林斯的观点最为典型。他认为,大战略是“在各种情况下运用国家力量的一门艺术和科学,以便通过威胁、武力、间接压力、外交、诡计以及其他可以想象到的手段,对敌方实施所需要的各种程度和各种样式的控制,以实现国家安全的利益和目标”。理查德·罗斯克兰斯和阿瑟·斯坦持同样观点,指出“大战略要考虑国家可以支配的全部资源(而不仅仅是军事资源),并有效地安排这些资源来实现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安全”。江忆恩则总结道:“美国学术界一般将大战略定义为动员国家所有实力实现国家目标的行为,这里的国家目标主要指的是反对外来干涉威胁的战略目标”。显然,把大战略界定为国家安全战略,既拓展了大战略的范围(因为安全战略包括军事战略、战争胜利),又凸显了大战略的政治性(因为国家安全是国家的政治事务,而不是狭义的军事事务)。但是,国家安全包括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这就导致了新的争论。

再次,大战略是国家战略(或国家总体战略),包括国家安全战略与国家发展战略。这种见解是对大战略的最宽泛的理解。1964年版的美国《美利坚百科全书》把大战略界定为“在一般意义上指在平时与战时,为获得对国家政策的最大限度支持,发展并运用国家的政治、经济、精神和军事力量的艺术和科学”。日本学者伊藤宪一也认为,“大战略不外乎是国家的最高政治战略,它决定着国家的百年大计,它还必须着眼于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发展与文化革命”。虽然大战略是国家总体战略的见解使其外延过于宽泛,但优点也非常明显,那就是便于从国内与国际、军事与非军事等多角度构建国家战略,而不必在研究时受更多的限定,做更多的解释,陷入概念的陷阱。

迄今为止,中国学者在研究大战略时更多的表现出对第三种见解的认同。比如胡鞍钢认为,“中国大战略就是‘富民强国’的战略”,其四大目标是“增长、强国、富民、提高国际竞争力”。时殷弘认为,“国家大战略是国家政府的一

种操作方式或操作规划,即自觉地本着全局观念,开发、动员、协调、使用和指导国家的所有军事、政治、经济、技术、外交、思想文化和精神等类资源,争取实现国家的根本目标”。叶自成认为,“大战略或国家总体战略实际上包含了三大部分,即国家的对外战略、国家的内部发展战略,还有一部分既是对外战略也是对内发展战略,是内外战略的综合”。此外,像中国军事科学院吴春秋、上海社科院周建明等也都视大战略为国家总体战略。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明确表示了对第二种见解的认同。周丕启认为,“所谓大战略,是指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对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以及其他手段来实现国家安全目的的筹划和指导”。他刻意区分了国家安全的国内层面与国际层面,并把大战略限定为国际层面。门洪华也以国家安全为立足点,并给出了一个独特的界定:“大战略是综合运用国家战略资源实现国家安全及国际目标的科学与艺术,即一个国家运用自身的各种战略资源和战略手段——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意识形态等——保护并拓展本国整体安全、价值观念和国家安全利益等”。由于门洪华在构建大战略框架时强调国家实力的评估以及重视国家安全利益,加之他倡导“打破国内战略和国际战略之人为隔阂,达致国内战略和国际战略的总体协调”,所以在其论述中,大战略实际上已超出国家安全的限定,而有了总体战略的特征。

鉴于上述概念梳理及其分析,本文主张立足总体战略来研究、构建中国大战略。因为当代中国之复兴与发展,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单一的对外战略、安全战略或国内发展战略。它必然是国内与国际、军事与非军事、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经济发展与全面发展等多向度、多层次的综合性战略。

中国大战略的主要依据

尽管大战略主要是一种外向型的战略(所以才会有将其定位于国家对外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的见解),但其实它总是涉及国际、国内两个向度,并且两者密不可分。这样一来,大战略的制定,其依据必然也离不开国际与国内两个层次。许多著名学者阐述了这一观点。美国学者威廉森·默里等人编著的《缔造战略》一书,列举了战略制定的诸多因素,如国际环境、国家地理状况、历史经验教训、意识形态和文化、经济技术要素、政府组织方式、战略决策体制等等,并明确指出,“战略缔造是个既涉及内部政治影响和个人行为特质,又涉及

外部事态和威胁的压力的过程”。理查德·罗斯克兰斯和阿瑟·斯坦主编的《大战略的国内基础》一书则更为鲜明地强调,“所有各章都揭示出,只集中于狭隘的现实主义构成要素——物质实力、其分配的变化及外部的威胁——的大战略算计是根本不全面的。它不能解释国家所实际做出的行动。相反,国内各集团、社会观念、宪法的特征(有时是通过国际相互依存表现出来的)、经济制约因素、历史上的社会趋势以及国内政治压力在大战略选择中起着重要的、实际上是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它们也是决定国际冲突与合作前景的重要因素。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下,这种国内力量的范围和重要性实际上是正在增加”。本文赞同从国际、国内两个向度寻求中国大战略的主要依据,除此以外,本文认为时代这一更宏观的因素同样不可忽视,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更为重要。现分别论述如下:

首先是时代依据。这里讲的时代是以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为标尺的大时代。当今时代是区别于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的新时代,即真正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时代。全球化使相互依存成为当代人类的生存方式和基本规律,任何一个国家在制定大战略时若不考虑全球化主题与背景,就不可能是一个有效的战略。当今时代又是区别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倡导可持续发展新文明的时代。换言之,讲时代的依据,不仅要突出全球化主题,还要突出文明转型的背景。没有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和超越,就难以确定富有前瞻性和人文性的大战略,而可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和揭示了人类新文明的指向。时代作为大战略的依据较之国际与国内环境更具有根本性、长远性。能否正确地判断时代及其新的特征,及时地认同时代的变革和文明的转型,并据此确立新的战略观念,把握历史发展趋势,将直接制约着大战略的历史深度与广度。

其次是国际环境。这里讲的国际环境是受到全球化和文明转型影响的国际关系环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个方面,但基点是政治。当今国际环境,从政治的意义上讲,最应关注之点是:

第一,和平与发展的主题。这一主题显然区别于战争与革命,突出了求和平、谋发展,从而更强调对话与合作的时代特征。正如学术界已达成的共识所明确的,和平与发展并非是完成时的既有状态,而是有待奋斗的目标。尽管战争与冲突仍存在,并有现实的合理性,但在价值上,其重要性已开始让位于和平与发展。因此,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是一种基于现实的更具价值导向的定位。

第二,两种基本社会制度的长期并存与竞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

制度之争并未随冷战的终结而消失,但两者之争的形式发生了变化,从体制外的对抗转变为体制内的较量,并且要经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因此,审视和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必须有更长远的眼光,更适宜的方式。务必把立足点放在加强与发展自身,而不是试图简单地消灭或取代对手。

第三,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国际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当今的国际事务由西方所主导,因为无论从硬实力还是软实力上讲,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都无法与其比肩,必须理性地承认这一基本事实。而这一事实则要求防止、克服各种情绪化的政策,坚持战略的务实性、有效性。

第四,国际机制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增强。正是因为全球的相互依存以及求和平谋发展的客观需要,所以体现对话与合作的国际机制越来越受到青睐。具体表现就是国际机制的领域拓展、数量增多,强制性加强,认同度提高。当然需要同时指出的是,当今的国际机制大多为西方大国所主导,因此其公正性不足,作用也受到限制。

第五,非国家行为体的日益活跃与崛起。在审视当今的国际环境时,如果忽视了 NGO、全球公民社会的作用显然是不明智的。因为非国家行为体正从多领域、多层次上影响着国际关系的议题、程序和进程,从而制约着各国的大战略。

再次是国内环境。就国内环境而言,涉及范围包括经济实力、政治进程、社会状况、国际地位与影响、观念与意识形态的变革、政府及决策者的素质等等。

第一,经济发展迅猛,综合国力大大提升。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持续经济增长已成为世界经济史上一个奇迹,从宏观经济指标上看,中国已是举世瞩目的经济大国。按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有人预言到 2020 年我国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

第二,国际地位明显提高,中国模式受到世人关注。综合国力的增强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有更多发言权,而更重要的是,中国渐进发展模式产生了吸引力。尽管“中国威胁论”仍然不绝于耳,但中国的历史性成就的确让世人不得不理性地探究中国模式的内涵与特色,从而扩大着中国的影响。

第三,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转变。中国在审视和处理国内外事务时,正在从传统的、习惯性的意识形态化转向非意识形态化,从对抗性思维转向非对抗性思维。这一转变为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妥善处理国内外社会矛盾提供了更有